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总队研究

戴斌武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文学丛

XUE ZHE WEN CONG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

戴斌武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戴斌武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8
(学者文丛)
ISBN 978-7-80696-918-2

I. ①抗… II. ①戴… III. ①红十字会—史料—中国
—1937~1945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7932号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

戴斌武/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 5 字数39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18-2

定 价: 37.00元

序 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陈廷湘教授

斌武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即将出版面世，嘱我为大作撰写序言。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我有幸与斌武度过难忘的三年岁月，经历了博士论文从选题、开题、撰稿、成文、修订到答辩的全部过程，自然对这部厚实的著作有着特殊的感受和体悟，因此，我慨然接受斌武的嘱托。首先，这是斌武学术生涯中重要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他为学界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值得我们热烈庆贺，同时，我对他的信任和眷念深表感谢。

斌武籍隶湖南新化，1973年生，出身农家，聪颖睿智，学习勤奋，善于独立思考，学习注重方法和效果，因此成绩优秀，1998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吴雁南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功底，毕业后献身国防事业，在武警贵阳指挥学院从事军校教育事业。斌武在攻读硕士学位及工作期间，勤于笔耕，此间，他主要以晚清地方督抚丁宝桢为研究课题，被贵州史学家称为“丁宝桢研究专家”。2005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又进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师从池子华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今年已顺利出站。斌武在其学术道路上已有所建树，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是一位颇具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

这篇博士论文约32万字，全文除“绪论”与“结语”部分，共分6章，是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我亲历了论文从选题到答辩的全过程，曾两度拜读，对论文已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对论文的创新和特色也

有更深刻的体认,举其大端,简论如下:

红十字会为国际性博爱恤兵之团体,自1863年瑞士设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1864年各国签订第一次《日内瓦公约》(亦称《红十字公约》)以后,欧洲多数国家先后成立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起源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部分上海绅商联合各国人士,商准英、德、美、法各中立国领事同意后,所设立的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宗旨是救援流落在东北战场的中国难民。国际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自结束1904至1905年间的救护工作后,延至1909年始行解组。但在此之前,清政府已同意组织大清红十字会,1907年并由政府颁发关防,令派时任商务大臣吕海寰任第一届会长,于1909年接收国际红十字会上海支会余款,在上海购置地产,建设医学堂,后主持该会的上海绅商,于辛亥革命期间再度集结,并且动员范围扩及海内外,最后于1912年改称中国红十字会,并获得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特殊的国际地位与属性,使得该会特别注重战地救护工作,从日俄战争时期,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一·二八”战役等,举凡民国以来中国国内历次战争,中国红十字会无不积极投入各项资源,凭借红十字标记的形式保护,获得交战双方的谅解,出入战场,救护伤患,甚至清理战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最大的慈善团体,与一般慈善机构最大的区别,便是它的工作有战地救护的内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支援抗战。国家危难之秋,中国红十字会更是责无旁贷,迅速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但当时中国社会医疗资源贫乏,军医力量薄弱,如要应付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伤亡疾病问题,势必得将现有医疗资源做有效的整合运用。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并筹组救护总队部,以林可胜为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救护总队乃为“战时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救护总队自

1938年春正式成立,经组织医疗、医防、急救、X光等37队,遍遣全国战区,另设汽车队、材料库分司运输补给,初期工作对象以技术为主,从旁协助各战区兵站后方卫生机关实施手术、矫治骨折、X光检查、细菌检验、特别营养等。1938年5月因汉口危急,临时救护委员会及救护总队先迁长沙,11月又迁祁阳,最后于1939年2月迁至贵阳图云关。因鉴于军中工作之经验,救护总队深以病兵人数多于伤兵,尤以传染病之流行最为可虑,乃综合医疗、医护、医防、急救各队之性能一律改称为医务队,尽量推进野战区,协助军师卫生机关从事手术绷带急救,并指导办理灭虱、治疥、抗疟、改进环境卫生及兵食营养等军阵卫生工作。救护总队在林可胜的领导下,由组建初期的37队开始,陆续扩充至178队,医护工作人员曾达3,420人,同时拥有救护车200辆,卫生材料分库11个,规模之盛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遂撤离贵阳图云关,在重庆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理难民医疗工作,后又迁回南京,1946年5月奉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

目前研究抗日战争史学者,大多把研究趣旨集中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沦陷区以及中日关系等方面,较少留意到抗战伤亡疾病的处理问题,对救护总队这一高度专业化、最有系统、最具规模的战地救护组织,涉足者更是屈指可数。作者以抗战期间专任战地救护工作的民间组织——救护总队为主题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窥视抗战期间伤亡疾病处理的实际状况,探讨战时整个救护体系的构建及其运作;还可方便于我们总结其战地救护的历史经验,凸显其战地救护的历史意义,还原其历史史实,达到战地救护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沟通。

斌武的博士论文征引资料丰富,考订翔实,且注释规范,一丝不苟。能否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是衡量一部史学论著优劣与否的重要指标。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作者寻找史料的足迹遍于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成都、北京等城市,并通过种种途径获取了散布在台湾省的珍贵资料。该书主要以贵州省档案馆及贵阳市档案馆典藏的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度藏的《中国红十字会档案》作为研究的史料基础,并运用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救护总队出版发行的期刊、书籍与民国报刊相佐证,同时参考最近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达到还历史本来面貌之目的。由于有比较翔实的资料作为基础,使本书显得厚重、坚实而生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戴斌武博士在该书中凡征引前人的观点、史料,均一一注明,充分尊重他人的劳动,即便是未刊稿,亦复如此,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以历史学实证方法为研究基础,同时借鉴军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准备,抗战初期的战地救护工作,战时救护策略的调整,救护总队的组建,以及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及工作内容与贡献等进行多纬度、跨学科透视,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救护总队在构建战地救护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战时三合一政策的互动关系。

学术界对救护总队的组建多少有所论及,但对救护总队的组织结构、资金来源与使用、材料供应、运输补给、人事管理以及救护总队医护人员的身分与待遇等相关研究却是一片盲区。作者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对救护总队的组织结构、组织运作等上述问题进行了史实重建,填补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战地救护与防疫工作是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基本主题,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笔者从救护总队全力协助治疗伤兵、治疗与转运伤兵并举、推进野战区救护工作以及对防疫工作的开展等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次比较系统再现了救护总队处理战时伤病问题的基本情况,弥补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整体而言,本书是作者在吸收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报刊、口述等资料,以历史学实证方法为基础,同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成果。

当然,从更高的学术标准衡量,论文尚有继续努力和提升的空

间。1. 论文虽然引用了大量史料,但在史料的解读和裁剪上存在些许牵强附会之嫌,对史料的驾驭和处理还不够功力,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提炼。2. 由于各种原因,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方面,对一些原始资料挖掘不够,使本文部分章节厚薄不一,有的章节着墨较多,有的章节略显单薄,整体协调性不够好,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尽可能的收集资料,给予补充和完善。3. 抗战救护研究是属于跨学科研究,需要具备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国防经济学及医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需加强相关学科的理论修养,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2010年8月28日

序 二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冯祖贻研究员

在戴斌武博士撰写的《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之际,谨向他表示真诚的祝贺!

(一)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是一部专史,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活跃于抗战时期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它的产生、发展和活动、最终被撤销,构成了本书叙述的主体。

众所周知,红十字会是个国际民间组织,在中国存在时间不算长,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于1912年9月29日(之前的大清红十字会、万国红十字会只能算是前奏)。抗日战争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红十字会最恢弘发扬的阶段;而它为它赢得最佳名声的就是救护总队的存在与作为。选择救护总队作为研究对象,便抓住了中国红十字会1949年前最辉煌年代的最骄人事迹。因此本书的面世,不只是将救护总队的历史向世人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而且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史填充了光彩一页。

抗战时期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研究,还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以往抗战史研究,多注重政治、军事方面,特别是战事的描述,却忽视了战场上后勤方面。那些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的活动,很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本书将救护总队做主角推出,为抗战史研究展现了别开生面的新的领域。

我们处在和平和发展的年代,但世界并不平静,许多非军事因素如自然灾害、疫情等更时时威胁着我们。如何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防止和减轻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因素对人类的伤害,医疗救护工作的正确开展是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救护总队经验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

(二)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以救护队为主体的救护理念如何产生的?它追求的“战时三合一”体制,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戴斌武博士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正如作者所述,抗战一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就投入了救护工作,从“一·二八”、长城抗战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虽取得不小成绩,但这一时期内的救护工作是以医院为中心开展的,医院的设置非依托大城市不可,当战线延长到广大农村,这种策略就不能应付长期抗战需要。林可胜提出的流动战地救护理念,则完全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同意设立救护总队并任命林可胜出任总队长的原因所在。

按林氏最初设计,救护总队下设大队,大队按战区分布,设有设备齐全的战区医院;大队下设中队,中队设战地医院,有X光机等基本医疗设备;中队下设医疗队,医疗队才是最基本的医疗单位,它紧密配合战场救护工作。每个医疗队配置医师(3人)、护士(5至7人)、高级助理员(3至5人)、初级医护助理员(4人)、事务员(1人),可独立承担伤员的清疮、包扎及基本手术。后由于战场的扩大、战事的延长,每个医疗队平均常在10人以下。总队为保障医疗器材的供应,另在各地设材料库;为运送医疗器材及伤病员,另建汽车运输站等设施。1940年,救护总队最盛时期,总队所属医疗队有178个,工作人员2887人。由于救护总队的上述机制面向战场,组织严密合理,在救护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取得显著成绩。

“战时三合一”机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将全国卫生勤务工作置于红十字会、军医署、卫生署统一领导下的新机制。军医署属国民政府军事系统;卫生署(后改为卫生部)则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系统。“三合一”即是将政府部门中的军、政卫生医疗部门与民间团体(红十字会)力量进行整合,这本是战时理想的卫生救护机制,但却因红十字会系民间组织,上层领导对“三合一”产生不同想法,以致矛盾重重。总队长林可胜从抗战大局出发是赞同“三合一”机制的。因为救护队要在战场上开展工作,不能不依靠军队方面的合作,也不能脱离地方医疗单位的合作。这时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门面临着医务人员的缺乏、医疗器材的短缺的困难,也亟须民间力量参与。“三合一”机制,就成了整合各方资源的好机制。

好的机制,执行起来并非没有困难。林可胜不得不奔走于红十字总会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而林氏与重庆国民政府上层的接触,更引起红十字总会上层的不满。戴斌武博士在书中认为林可胜不得不于1942年辞去救护总队队长职务的最深刻原因在于此,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可胜离开救护总队,使救护总队失去灵魂。总队工作开始走下坡路,国民政府反加强了对总队的控制,随着抗战胜利,总队最终在1946年正式撤销。

作者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上用了较大篇幅,其用意极为清晰:一个新的理念提出,必须用从具体的国情出发,符合时代的需要,贴近实际;另外,一个新的机制产生,必然要调动各种资源,而资源的整合与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便成为新机制获利者(往住是国家)智慧与执行力的考验。戴斌武博士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给我们很好的历史启示,是另一种形式的“古为今用”。

(三)

要对抗战时期救护总队展开全面研究,就不能离开救护总队创立者,也是救护总队的灵魂人物林可胜博士。

通过本书介绍,可知林可胜是英籍华人,他的英语比汉语要好。林为人极富正义感,在英国求学期间就去过西班牙,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斗,也是在那里,获得了战地救护经验。回中国后在协和任教,华北战事中他投入了战场救护工作,由他组织的协和师生医疗队表现突出,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从本书对救护总队组织、系统建设、管理制度制定、各支救护队分工等的细节描述中更能深知,林可胜还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动员者。此外,林可胜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国际卫生界反法西斯人士纷纷投奔救护总队(作者统计达34人);外国不少援华捐款都直接汇寄给林本人;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外国所捐的钱物,指定捐给救护总队的,也不在少数。后两项曾引起了中国红十字会领导层对林的不满。

围绕林可胜辞去救护总队队长一事的分析,是本书很吸引读者的部分。除前述红十字总会对“战时三合一”机制的不满外,涉及了林可胜的“左倾问题”。作者引述了大量曾在救护总队服务过的老人回忆,“左倾”依据有:林曾容纳共产党员在总队服务,共产党曾在总队建立过组织;林曾阻挠特务对共产党人的搜查、迫害,甚至共产党人被捕,林出面进行保释等。其实不止这些,作者以大量可靠的档案资料,说明了总队所属各支救护队曾进入八路军、新四军战区中进行救护服务。如第7、21、23、33救护队就进入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及中心城市延安。其中第29和第7队在1938年3月1日至12月25日,还在延安的边区医院主持门诊、开展防疫工作。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林可胜同意下,救护总队还向八路军、新四军地区运送药品、医疗器械,这不能不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不满和猜忌。重庆国民政府本对林氏坚持“战时三合一”机制是赞赏的,却对林氏的“左倾”表示反感,以至重庆最高当局包括蒋介石本人也当面向林氏提出;地方军、警、特更是制造麻烦,林氏本人即被拘留过。林氏是否真的“左倾”?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作者在本书中的介绍,林氏是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个国际主义者,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显然高过同时代许多人

的水平。由此我们不难推测,林氏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国共两党都在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力量,那么就应不分彼此;红十字会的原则又是人道和中立。因此他的“左”,正好证明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坚持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路线。作者曾引用多方论述称,当林可胜的谣言满天飞时,连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不相信林可胜是共产党。但重庆国民政府给予林氏的政治压力是不言而喻的,红十字总会领导层也正利用了这一点,林可胜终于在双重压力下不得不选择了辞职一途。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研究,主要是在回答林可胜辞职的原因上,并未对林氏的政治态度下过多的笔墨;但作者所引大量史料,至少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的确有一批政治上坚守中立,但却有着爱国情怀,全心全意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不止林可胜一人),他们在抗战历史中也应有自己的历史地位。

(四)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一书是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陈述而完成的,历史事实则来自于档案,这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据作者介绍,仅贵州省档案馆所藏救护总队的档案就有3193卷之多,贵阳市档案馆也藏有救护总队档案909卷,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度藏不少有关救护总队的档案。救护总队的档案大多留在贵州,是因为救护总队的总部所在地设在贵阳市图云关的缘故。档案虽卷帙浩繁,却是当时、当地发生事件的记述。其史料价值之高,是其他任何资料不能比拟的。档案,加上当时公开的或非公开出版的刊物,亲历者的回忆,相互比较、梳理,才能将事件的本来面貌呈现给读者。

本书对档案的研究和使用是很成功的,这里仅举一例。要全面评述救护总队的贡献,离不开它下属各支救护队的事迹,而各支救护

队的活动(包括活动的地区、战场的变化、各项工作的开展及具体数字等)情况,就来自各队向总队的报告书,本书第五、六两章就是在上述报告等档案基础上经过整理写出来的。至于总队的组织体系、“战时三合一”政策推动,本书更大量征引档案史料来加以说明。有了丰富档案作研究基础,还有各种资料的贯穿使用,救护总队整个活动的全貌才得以向读者依次展开。本书的结论,包括对救护总队的总体评价,都建立在上述资料的分析论证基础之上。因此,无论是结论还是全书,都显得厚重、坚实而生动,并无夸泛之语。

我本人还在高校指导研究生论文撰写,工作中常感时下年轻朋友也许受学术浮躁空气影响,不愿下功夫钻研问题、细致阅读应占有的史料。两相对比,更显得戴斌武博士写此书时毅力的可贵。史学大师汤因比说过:“需要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他更指出历史真实研究的重要,“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种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引出这些话,无非是想与戴斌武同志和一切有志于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不拒绝“回归”历史“真实”的朋友们共勉。

2010年9月8日

序 三

武警贵州省总队副总队长 李儒义大校

斌武博士是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部的一名中校警官,也是一名青年学俊,论述颇丰,迄今已有 50 余篇论文见刊。我虽是他的上司,但却是一个“大老粗”,里外没有多少“货”。所以,当斌武博士将其大作《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置于案前,邀我作序时,我一方面“受宠若惊”,另方面也“诚惶诚恐”,原因是我觉得要在一部这么好的大作前面,加上我这么个“门外汉”的一番废话,着实挺不匹配,也相当不给力。故极力推辞,然斌武很坚执。盛情难却,我只好“滥竽充数”,略说一二。

(一)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们了解人类过去和人类自己的一种特殊介质。对于绝大多数非历史专业的人士来说,他们获取和汲取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意识的主要渠道不是历史档案和历史论著,而是那些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的文艺作品、坊间传闻或历史遗迹。我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历史认知就是从历史遗址的渠道开始的。数年前,我在贵阳东出湘桂的咽喉之地图云关郊游时,闻知在这群山密林之间,坐落着一个抗战时期设在贵阳的机构最大、影响最广、业绩卓越的社会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但因缺乏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好奇心的鼓舞”,也未有现成专著可阅,所以对其历史演进轨迹、组织结构、嬗变过程及历

史作用等知之甚少。所以于我而言,斌武博士的《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一书就是现成的“精神食粮”。而且据我考察,目前学术界对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该本应该还是学界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的首部较为厚实的论著,是一部具有前沿性与开拓性的研究专著。其对救护总队的组织结构、组织运作、资金来源等诸多问题的探究,是目前学术界绝无仅有的。可以肯定地说,该书的付梓,将使目前尚无专门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著作问世的现状成为历史,亦为贵阳市挖掘贵阳抗战历史文化,筹建图云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旧址纪念园区”提供了完整的佐证材料。

(二)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为要探究和展示过去未曾关注的人与事的真相,势必要尽可能穷尽所能占有的资料。读者看完《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一书后,应可觉察到,该书不仅史料翔实,占有大量档案、报刊及历史文献等原始资料,而且讲求历史学实证方法,注重归纳总结。作者通过剥丝抽茧、细致入微的梳理,将尘封在历史档案里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论著的着力点有四:一是窥视抗战期间伤亡疾病处理的实际状况,探讨战时整个救护体系的构建及其运作;二是透过分析救护总队的组织发展、组织结构、组织运作、主要工作内容与贡献等议题,探究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策略为何调整;三是探究这一调整的主导因素何在;四是探讨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的关系,以及救护总队在构建战时救护体系中的角色、地位等问题。

(三)

鲁迅先生评价司马迁之《史记》时,称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对《史记》的可读性予以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非史学专业的读者，我以为如果说资料翔实是历史论著的灵魂所在的话，那么可读性则是历史论著之存续的命脉所在。只有可读性强的历史论著才能使读者能看下去，甚至爱不掩卷。读罢斌武博士的《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一书，不难发现，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书中人物形象（如林可胜）之论述真切饱满，历史情节（如救护总队防疫）之描绘曲折生动，谋篇布局合理、逻辑连贯、文笔清新流畅。作者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秉笔直书，有史有论，其中有些内容鲜为人知，值得阅读与深究。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对于一个具有开拓性的青年学者而言，一个研究课题的完成只能证明艰辛的劳动所换来的阶段性回报，后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课题需要去攻克。我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教。

谨以为序。

2011年8月28日于贵阳